

*Blood Work: Life and Laboratories in Penang.* Carsten, Jane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256 pp.

鄭瑋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B**lood Work一書是Janet Carsten以2012年Lewis Henry Morgan演講內容為基礎的成果，該書以馬來西亞中小規模私人醫院的血液實驗室的各類技術人員的工作、生活與生命史為例，藉由血液這個實質（substance）象徵化的能受力（capacity），以及涉入日常活動中性別、親屬、族群性及宗教甚至國族等社會範疇之間的交互滲透，呈現出該國從1980年代以來，現代化過程如何將這個機構空間與活動與其間的人彼此糾纏，展現出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的另類現代性。特別是，她指出血的象徵特性如何在看似沒有直接關聯的個人、關係、機構到國族等之間流動並形成了社會性（sociality），在不同層次間建立隱喻關聯，血更對其所流經之關係或領域進行自然化的作用，呈現出多層次的聯繫性。由上述現代化與現代生活圖像，作者拆解了親屬、宗教與科學等社會範疇及其做為畫分領域的實作（practice of domaining）的現代性神話。對於這本書在人類學研究上的定位，撰寫序言的Thomas Gibson認為該書既有英國人類學視親屬為道德性之形式的關懷，並觸及美國文化人類學對於親屬做為文化的象徵與意義領域，更回應了科技與社會研究反思現代性與科學知識將社會生活純化（purify）為各自分離的領域，如親屬、政治、經濟、科學與宗教等的實作。

Carsten以觀察冠狀動脈繞道手術過程為楔子，提出關於如何在手術過程中，參與手術者無法從手術過程或數值指標，明確判斷說出病人生或死的狀態，來呈現醫院這個現代性機構的運作。這個充滿了難以對生命的真實狀態進行客觀指稱與辨認的時刻，提供了讓血液這個既充滿社會文化特殊性卻又是所有人類共像的實質登場的舞台。首先，作者從研究史中標定出血液這個實質在人類社會文化中所被賦予的象徵意義，一方面援引邊界物（boundary

object) 這個概念來定性並掌握血液擁有流動的特性如何穿透不同社會領域，另一方面指出血液實質所展現的象徵能力與多重隱喻的連結，往往超乎邊界物這個概念所指涉。更重要的是作者挑戰現代性秩序假定了社會範疇及其畫分領域的霸權，並勾繪、呈現出馬來西亞這個多族群國家所展現的現代生活樣貌。

Carsten鋪陳第一章的主題的是關於血液的公共生活，透過馬來西亞報紙新聞來再現馬來西亞政府與民間對於捐血的想法與態度：官員鼓勵民眾捐血助人，緩解血荒，將其等同於「超越種族與宗教的善行」（p. 39）來發揮馬來精神。這類為了跨越族群、宗教、家庭、認同等障礙或「文化因素」（如，穆斯林不願意接受非穆斯林的輸血或器官移植）的政治修辭和道德論述，亦受到民間組織與醫院與各項配合活動的支持。在醫院血液銀行這個層次上，Carsten將捐血記錄手冊當作個人生命史的象徵與紀錄，從訪談中獲致不同的捐血動機，或與家人親屬的記憶有關，或與確認自己生命意義有關。血液銀行的捐血紀錄簿既呈現了社會範疇的遍在與混淆（如，填寫捐血表格必須載明個人族群身分，但在該國常與宗教和種族混淆），卻在進入血液實驗室的鑑測過程中成為無意義或毫無作用的範疇。然而，實驗室專業技師與技工在交談實際工作過程中有時不得已而採取不合乎科學客觀的做法，例如將血液鑑測後果（如HIV陽性比率）或捐血頻率，與特定族群相互連結，甚至因為不敢直接詢問捐血者的性行為與性傾向，於是就以對這些人的刻板印象來猜測捐血者是否屬於高風險群，甚至拒絕其捐贈。

進而帶出第二章主題的媒介再現是，報紙除了聚焦那些影響經濟民生的重大政策，例如，油價上漲所造成的物價波動，新聞攝影也會放大處理暴力與意外事件中涉及血液的場景，這些直接衝擊日常生活甚至帶有煽情意味的影像，很容易吸引那些在血液實驗室工作者的關注。這些生長在馬哈地主政下的現代化過程中的血液實驗室員工，其生活感受及進入實驗室工作促成社會流動的生命史，串接了新聞再現與實際工作中「馬哈地之子」的面貌。第二章是以實驗室員工藉由擺放魚缸與盆栽，使被區隔的空間看起來更像家。儘管實驗室工作高度仰賴機器、重複性高且需要耐心，加上有升遷的玻璃天花板，經常被認為是適合女性的工作，但此區的男性還是不可或缺。再者，

同事間透過食物交換與日常互動而來的友誼，讓看似獨立進行的血液與生化檢驗過程更為順利，以此形成社會性。更具意義地，實驗室中的社會性往往以親屬、性別與族群這類譬喻或語彙來進行，具有鬆動族群與宗教界線的作用。Carsten稱之為對實驗室的馴化（domestication）。

第三章以2008年安華所屬的反對黨人民正義聯盟擊敗執政多年的國民陣線，卻因被前助理控訴雞姦，導致執政黨要求安華提供檢驗血液樣本進行DNA鑑定讓真相水落石出。這種將血液樣本看成「真理的圖像」（an icon of truth）（p. 116）的宣稱，不只是政治角力，更涉及到該國社會認為血液具有揭露個人道德的能受力，而安華抗拒提供血液樣本則是擔心檢驗結果遭竄改。在兩黨對決的風暴中，重點不在於檢驗結果，而是血液具有多重象徵共振或共鳴（resonance）的特性，特別是血液被賦予的道德屬性。血液的多重象徵共振或共鳴因而成為第三章的主題。從實驗室的紀錄、分類、篩檢、檢驗、貼上識別標籤等執行分離技術（technologies of detachment）（p. 128）的過程中，Carsten呈現出不同技師與技工有時為求方便而違反衛生規定、分享食物、主動協助病人以及為機器賦予親屬稱謂等形式，交疊成社會性。這些為工作建立個人敘事的實踐反轉了實驗室所要求的分離與匿名邏輯（p. 150），如同重新賦予人性（rehumanization）的過程（p. 151）。在實驗室工作的人因著處理血液這個曖昧、多重又不穩定的物質而帶入社會交換，形成多層次的交纏，更重要地，這兩者間的關係是透過人們在實驗室中的實際工作與情緒的性別勞動而呈現出來。

第四章以當地報紙中經常出現關於吸血鬼與鬼魂被血液賦予生命的力量所吸引的報導，同樣可見於實驗室。在國家政治相關報導中，血液除了具有標定「種族」之間的道德與政治和諧的作用，更指向超乎預期的惡意或犯行，甚至是國家反制各類反對活動的權力。這種結合了人類與超自然且帶有鬼魅意味的事件或故事，無疑是當代馬來西亞都市生活的重要特徵。對於事件的道德解釋與考量更貫穿了醫療報導、商業行銷以及引入的國外醫療技術中，因為那涉及了人們對於醫療、社會乃至政治場域的信任與貪瀆之可能性的焦慮。這些難以言說的焦慮在實驗室中則是以不完全相同的方式展開。除了第三章所述之工作內容之外，實驗室更是充滿了其他形式的社會性：食

物共享與交換、以小孩與生育為中心的日常互動和相互關心、分享並運用不同醫療體系的知識（如中醫、印度的阿育吠陀醫學），以及個人宗教經驗對於工作態度的支撐與影響。然而，這些深化同事情誼與關係的馴化並非沒有負面效應。除了醫院與實驗室中有關鬼魂的種種傳聞，往往出現在被認為陰暗髒污或人體血液大量流失的空間中，而血液特有的賦予生命的力量更會吸引鬼魂前來。事實上，鬼魂的出現被詮釋為是實驗室的管制體制無法完全保證工作所需之技術的安全性所致，特別是有各種形式社會性滲透其中。此外，Carsten認為實驗室中的不均質滲透尚有其他意涵：其一，出現在實驗室中各種形式的社會性，相當程度上凸顯了族群文化及其界線之間的可譯性（*translatability*），甚至有力量促成更普同且抽象的馬來西亞公民身分，以超越族群分野。其二，滲透於實驗室的社會性也同時隱含了工作環境與過程所招致的風險，鬼魂的現身表達了空間被馴化之後，讓工作過程出現了模稜兩可的模糊性與臨時性，甚至涵蘊了危險，就有如人們對於醫院追求商業利益將危及他們對捐血相關活動的信任。

Carsten在結論中指出，血液的流動性形成了跨越不同社會領域、時序和關係的多層次關聯性，這個源自親屬的身體物質具有賦予生命的特質（*quality of animation*）（p. 206），或者說，擁有賦予生命的權力（*animatory power*）而有了隱喻化的傾向（*propensity for metaphorization*）（p. 207），並能發揮自然化這項能受力，跨界累積了多向度的隱喻連結，破解了將親屬、政治、經濟、科學和宗教視為各自獨立領域的迷思，凸顯出既在地又普遍的日常現代性。

首先，該書書寫清晰且平易近人，民族誌材料十分日常甚至瑣細，但我認為值得留意之處在於，作者以文化實踐論的方式來處理國家這個層級和機構與個人層級之間的關聯，亦即，她先以一節關於大眾媒體對於不同事件對於「血」這個親屬的核心實質的再現，做為引子，再以個人實踐來挖掘並深化所運作的社會範疇與意義。這些除了呼應媒體的再現，更重要的是呈現那些無法被再現的意義與社會性。作者以不同性質的象徵關係來處理與呈現國家、機構與個人之間的關聯性這種寫作安排，其說服力與適切性是建立在她過去對馬來西亞親屬關係及其文化邏輯的研究之上。這個常見於當代小說

的象徵手法，對民族誌書寫與學術研究上的意義在於要求我們去思考：有關現代性之下的個人、文化價值、社會範疇、機構組織及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否有其他重新概念化的可能？

其次，我認為，作者對報紙上政治新聞與社會新聞對於馬來西亞社會生活脈動的再現，與醫院實驗室民族誌及其社會性之間，是以換喻、平行、隱喻與提喻（synecdochical）等象徵關係而彼此聯繫，再依循著血被抽離出身體的機構過程、處理血液的空間與社會性、被分類與再製的血液產品，以及社會性對血液實驗室及其管制體制既賦予人性卻又帶來風險的作用等四個層次，進行討論，希望藉此證明實驗室做為社會與制度的實體（a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entity）（p. 156）。就象徵分析層次而言，作者使用了象徵分析常見的手法，來建立公眾媒介的宏觀再現與實驗室內微觀互動之間，多樣又不均質的關聯性。本書以血做為核心象徵的分析，並不意圖去建立一套與個人生活及生命無關的意義系統，而是透過物質性（跨越場域與範疇的流動性而有如邊界物）以及被賦予的社會道德意義，讓散落在不同場域的象徵意義以超乎表象的關聯性被銜接起來。此外，在社會與實驗室之間、實驗室個部門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對於意指的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或物件所開展出來的象徵化過程，並不總是透過我們習以為常的相應（correspondence），反而更常藉著共振或共鳴，讓彼此相互關聯。

再者，就本書對於機構展現了社會（the social）性質的這一點而言，作者以不斷滲入實驗室中的社會性與社交活動，和社會文化的邏輯，清楚說明了實驗室生活與運作不可能與社會相互分離。然而，若僅將該空間內的象徵流動性與社會性當成證明實驗室做為社會實體的材料，是否反而阻礙了我們對於現代生活或現代性甚至「社會」的重新概念化？

事實上，在辨識出實驗室的實作與空間背後所預設的二元對立以及對於秩序、衛生與標準化程序等過程中，經歷馴化與重新賦予人性以展現社會性的同時，作者指出這些過程亦會帶來反面效應，如被視為髒污、失序與涉及血液不當處置的空間，往往是鬼魂現身的所在。作者認為，鬼這個意象銜接了不同世界的人與生活，成為實驗室中跨族群的人們對於醫院中各種超自然現象的共通語彙。甚至我們可以說，鬼魂有如對於顛覆實驗室規範之作為

的一種警示。不過，作者提到，實驗室員工異口同聲表示，自從實驗室搬遷到新大樓後，鬼魂就不再出現。這個插曲讓人不禁追問：鬼魂這種神秘怪異（the uncanny）的意象，除了做為被排除在現代性之外的社會生活之意象，其現身所引發的恐懼與議論，難道不是施展了護衛現代性秩序的效應？亦即，使得工作的專業技師與技工更有意識地，或者不得不維持實驗室的內部空間區隔，以及工作程序的清潔衛生與秩序？順著這個思路，我們是不是可以推論：在馬來西亞這個不算資深的現代化國家，現代性的純化過程、社會範疇及其畫分領域的實作，一方面被個人的日常社會實踐所顛覆，另一方面弔詭地被鬼魂這種前現代的、神秘怪異的非理性意象所肯認？

筆者樂意將這本書推薦給對東南亞、親屬、族群（性）、醫療、現代性以及象徵理論有興趣的讀者。

